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

哲学的文化转向

ZheXue De WenHua ZhuanXiang

洪晓楠 著



人民出版社

哲学的文化转向

ZheXue De WenHua ZhuanXiang

洪晓楠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文化转向/洪晓楠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

ISBN 978-7-01-008200-4

I. 哲… II. 洪… III. 文化哲学—研究—中国 IV. 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2009)第159512号

哲学的文化转向

ZheXue De WenHua ZhuanXiang

洪晓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8.25

字数:405千字 印数:1~2500册

ISBN 978-7-01-008200-4 定价:56.00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总序

科学和人文是一对孪生兄妹,两者可以说是“相融是利,相离则是‘半个人’”(杨叔子语)。

英文的 science 一词基本上指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 science 来自拉丁文 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 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 scientia 类似,含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从静态的观点看科学是一种认识成果,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科学是小规模的运动,主要是少数学者和哲人的个人活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相继建立了一批大学和科学院。尤其 19 世纪以后,科学活动的规模空前扩展,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才迅速发展。到现在,科学活动不再是少数人进行的纯学术研究,而是由众多社会成员参加,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科学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事业、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如今运用动态的观点把它看作是进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认识世界的一种过程,生产科学知识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科学技术能使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帮助人类提高认识能力,同时人的认识世界的预测能力更是全面提高,突出人的主体性,表现了科学认识的能动性。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它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一种高尚的文化成就。早在 17~18 世纪,科

学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被纳入整个文化体系,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到了19世纪中期,科学文化更是蓬勃发展,在某些人心目中,科学文化简直是文化的典范,代表着文化的未来。如今,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科学文化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过程。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汇,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而且科学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政治、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文化传统。

英文的 Humanities 直接来源于拉丁文 Humanitas,而拉丁文 Humanitas 继承了希腊文 paideia 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 Humanitas 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 Humanitas 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 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 humanitas 以希腊文 paideia 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①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① 参见吴国盛:《反思科学》,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

人文学科一词来源于公元前 55 年,西塞罗在其《论雄辩家》一书中首先把 *humanities*(人之品质)列为辩论者的一项基本训练项目。后来经过希腊罗马修辞学学者的发挥,*humanitas* 就成了古典文科教育的基本大纲。再往后,由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教父们使之转为基督教服务,它又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徒的基础教育,构成了称之为 *artes, bone artes*(“通艺”)或 *artes liberales*(“自由艺术”)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数学技艺和语言艺术,也包括某些科学,历史学以及哲学。欧洲十五六世纪时期开始使用此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区别于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等。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仿照美国体制分为 3 个学院,其中的文学院教授的就是人文学,简称文科,以别于教授自然科学的理学院和教授社会学的法学院。

科学与人文都是社会文化现象,所以对它们的考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系统去孤立分析。科学与人文本来是统一的。在古希腊时代至欧洲中世纪科学和人文皆被包含于哲学之中,是处于一种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状态之中,当然,这种浑然未分的统一是由于科学和人文学科皆未分化的结果。近代以后,当人文学科从中世纪的神学解放出来,尤其是科学真正意义上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时,科学与人文真正走向独立。此阶段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双向互动的主要特征,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机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相互对立,彼此竞争的互斥机制。人文运动把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人文主义的传播。用理性来对抗神学迷信,就是这一阶段科学与人文携手共进的重要目的之一。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科学在西方已不仅仅是一种观点或学说了,它已是建制化的活动,已是最有权威性的实践。到 19 世纪下半叶,科学成为主旋律,几乎占领了整个知识领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相信只要掌握了科学就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另外科学对社会系统的作用愈来愈大,成为推动社会系统进步的主要力量,从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然科学绝对化,产生

了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观,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经验的知识才是确实可靠的,即实证的。科学几乎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即“判定什么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科学主义的诞生不仅否定了宗教权威,而且动摇了以人的感性经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人文知识体系。而这一时期人文精神对社会的影响日渐消退。科学与人文之间表现出逐渐分离的趋势。人文固守绝对价值目标,忽视通往这一理想境界的现实道路。

近代以来,科学探索与人文探索关注事物的角度、它们的知识系统、文化思维、问题域和观念系统等等不同,科学和人文处于分化,对峙状态,甚趋于紧张。另一原因是人为原因,这就是受现实的功利价值、经济效益趋使。在现代社会,随着实证科学和近代技术的兴起,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角色转换。由于社会制度的作用,自然界开始变成被人们操纵的对象和被人们利用的工具,人本身变成了中心。科学作为工具价值的一面和作为目的价值的一面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以致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科学的异化现象,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征服,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把当代人类推向了严重的生存困境。科学成了统治人的外部强制力量,这种状况,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家不是对科学本身的异己性进行批判,而是对科学本身进行拒斥,用人文世界拒斥科学世界,从根本上否定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并用艺术精神和非理性主义来取而代之;而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思想家则把科学的人文价值从科学的价值中剥离出来,把科学理解为与人生存的意义完全无关的关于纯粹事实的科学,并进而用科学世界拒斥人文世界,科学与人文截然割裂。科学主义者突出强调的是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来审视别的文化,忽视或贬低人文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本主义者则突出强调艺术和非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以“人”为本来审视一切文化,排斥和否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便进一步加深了。19世纪末最接近于对“两种文化”的分野进行表述的,是标榜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历史学派传人李

凯尔特,他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对立。

自从实证主义产生之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别日益明显。实证主义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严格区别科学与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提出了分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兹后这一问题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被科学哲学家们广泛而激烈地争论。从总体上来看,自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中叶,思想家们大都在论证两种文化的独特性,给它们划界。实际上,这无意中加深了两种文化的裂痕。自20世纪中叶之后,思想家们大多从揭露两种文化的分化的弊端出发,寻求弥合两种文化裂痕的途径和方式。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同狭隘的实证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无法看到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人本主义者只看到科学技术对人、自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直接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而看不到科学技术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因而看不到科学技术同人的生存、栖居、自由和发展的深刻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近代人文主义运动在近代前期带来了科学的发展,并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近代后期,由于科学自身独立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功利主义的应用,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相互排斥,相互分离。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科学主义的悲剧还是悲观的科学虚无主义的误区,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离开了科学与人文的整合所致。

从整个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的教育都十分重视人的素质的培养。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人文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中国在19世纪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发展专业技术教育。在20世纪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深受原苏联的影响,文理分家,理工分校,专业面狭窄。我国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法、经、社、农、医、工程

等主要学科中,理工科比例太大,造成畸形发展。人们在思想上重工轻农,重理轻文,重“硬科学”轻“软科学”,即便在文科中,人们又存在着重社会科学轻人文学科的倾向。

当前,对于理工科大学生来说,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尤其重要;对于文科大学生来讲,提高科学素养也是当务之急的问题。通过近十几年来的努力,人们已经逐渐形成了“大”文化素质教育观。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要相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要相融,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要相融。相融则利,相离则弊。科学素质、科学精神,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就是在科学知识、人文知识中形而下的东西,经过人的努力,特别是经过人的实践,在实践中深思,在实践中体悟,在实践中磨炼,内化升华,形成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东西。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精神就是人文的东西,所以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的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就是应以“实事求是”作为其基础的求善精神,从这一角度讲,就是求善的科学精神。科学与人文都有共同的追求。科学追求真,人文追求善,两者结合,保证追求正确,保证结果可以完美。这就是追求真善美高度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真善美都是围绕着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的明天。一个正确的思想,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必定是逻辑思维同形象思维、科学技术思维跟人文艺术思维的高度的统一。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自1999年成立以来,学院的发展得到了学校领导以及学界同仁、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经过10年的努力,学院在人文社会发展方面基本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在教学上,由以“两课”为主的教学工作向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导、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教育快速发展模式的转变;在人才培养上,由专本科和短期培训为主向本科生、研究生培养为主转变;在教学与科研关系上,由教学主导型向学科建设为基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并重的模式转变。目前,随着学科快速发展的需要,学校在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中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正在按照“文理渗透、中西融汇、学研一体、博专结合”的理念,努力形成以理工

管交叉渗透为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

2006年大连理工大学决定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007年就拿出112万专款用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时决定以后每年拿出100万元作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这可以说是学校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2009年学校又提出文科要入主流,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期待,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理所当然地要一马当先,提升我们的学科水平。基于此,我们在编辑出版“科技哲学与科技管理丛书”的同时,结合我们学院学科较多、覆盖面宽、涉及面广的特点,本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人文”的宗旨,编辑出版“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是一套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研究领域的综合性丛书,具有基础性、交叉性、哲理性、现实性、综合性的特点,内容主要涵盖科学与人文综合研究的诸多方面。举凡涉及科学、人文及其关系的内容,均收入这套丛书。这套丛书是我校“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中的著作或者是我们学院部分教师承担的各级各类研究课题的成果,或者是来自名校的年轻博士的博士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持续不断的出版和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进一步搞好我们的学科建设,形成我们的学科特色,而且为实现“文理渗透、中西融汇”,促进我国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发展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洪晓楠

2009年8月8日于大连

我相信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另类的现代性之可能,
亦即现代性是“多元的”。

——[中国香港]金耀基

前 言

《哲学的文化转向》这一书名的灵感来自于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文艺评论家、理论家，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詹姆逊 1998 年出版的新书——《文化转向》，该书揭示了西方当代社会和文化转向的轨迹。我借用这一书名，主要有两重含义：其一，在宏观层面来看，我认为当代哲学存在着“文化的转向”；其二，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也存在着所谓的“文化的转向”。

一般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从长时段来看，已经发生了三次转向。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关心本体论问题，即“存在是什么”；由于笛卡尔引起的认识论转向，所以他被视为近代（Modern time）西方哲学的开创人。“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变革，一次是认识论转向，一次是语言转向。第一次转向使哲学的基础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变为认识论，从研究超验的存在物转到研究认识的主体和主客体关系，而第二次转向把对主客体的关系研究变成了对主体间的交流和传达问题的研究，把对主体研究从心理学领域（如观念、思想）转移到语言的领域（语句和意义）。”^①第三次转向在我看来就是文化的转向。同样，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始终离不开对文化问题的关注。20 世纪中国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古今中西”问题。就此来说，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典型形态就是文化哲学。

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哲学探求的荆棘之

^① 徐有渔：《“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5—6 页。

路》来回顾自己一生从事哲学研究的历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探求是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荆棘之路”。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一个人是如何走上哲学探求之路,这个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并不容易回答,而对于我来说则是非常明确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许多学者就是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的启蒙下走上哲学探求之路的。我曾经在一本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虽然在我的启蒙教育中,我获得的哲学教育并不理想,但是在学物理的过程中,经常阅读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的著作,他们的著作中闪烁着哲学的智慧,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和影响。

我是伴随着《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与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等杂志成长起来的。正是在这些杂志刊登的佳作的启蒙下,我到处搜寻最新出版的西方科学哲学名著,如饥似渴地阅读哲人科学家的著作,拼命地弥补自己知识结构的不足。正是这些努力,当我从自然科学领域步入人文学科领域并准备真正开始自己的跨越“两种文化”(C. P. 斯诺语)的研究时,我选择了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重要影响的奥裔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进行专题研究,先后发表了《弱归纳原理与假设—归纳法——兼评波普尔的反归纳观》《波普尔社会政治哲学简评》《康德哲学与波普尔哲学之比较研究》《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贫困》《论波普尔的文化哲学》等论文。

就我个人研究的旨趣来说,由于大学时代学习的是物理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对于理论思维、抽象思维有偏爱,因此,通过自然科学、自然辩证法接触到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我还记得大概大学二年级寒假时我获得了一本物理学家惠勒演讲集《物理学和质朴性》,那时我虽然还不能完全看懂,但我已经知道其中的重要性和哲理性。现在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在那本书上所作的笔记和眉批,感到十分惊讶!大学三年级的寒假,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海森伯写的《物理学与哲学》,我利用整个寒假如饥似渴地阅读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所写的这本科学哲学著作,并写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当时的阅读经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国外著名的科学家有如此深厚的哲学底蕴,而我们国家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却

远离哲学,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这种状况下,我又利用平时学习时间和假期阅读了《爱因斯坦文集》、爱因斯坦和他的学生所写的《物理学的进化》、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所写的《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和《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续》、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所写的带有哲理性的著作《物理学的方向》。所以我在物理系工作三年后,考入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我的主攻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也花了不少时间关注科学哲学,同时在此期间也打下了比较好的研究文化哲学的功底。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把准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适时地调整到文化哲学研究,就是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也主要是从科学文化哲学的视角来把握。我曾经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如果没有《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的引领,没有哲人科学家著作的教诲,没有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特别是在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花了半年时间到中文系旁听了《现代中国文学》课程),我就不可能实现从一个科学主义者到积极主张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研究者,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去开拓文化哲学的研究方向。我希望在科学文化哲学、人文文化哲学两个相互联系的方向上做出自己的成绩。在人文文化哲学研究方面,我先后出版了《文化哲学思潮简论》《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等专著;在科学(文化)哲学研究方面,我先后出版了《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科学文化哲学的前沿探索》《自然科学概论》《十大科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自然科学》《文明城市论》等著作,力图进一步开拓和深度耕犁“科学文化哲学”的研究领域。我深知自己不过只是一个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学习自然科学的工大学生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和一些著名物理学家带有哲理性著作的启蒙下成为哲学研究者的个案,还有许多与我有相似经历的学者,我们都是通过《自然辩证法通讯》等杂志走上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的。如果说《自然辩证法通讯》影响了一代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毫不为过。我的学生中经常有人问我是否后悔选择哲学,我对他们说,我虽然有多次机会选择其他,例如,我教过《高等数学》和《经济数学》,因此也有过选择经济学研究的机会,但是我还是固执地坚持走自己的哲学探求之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觉地选择了哲学,我爱好哲

学,哲学与我的生命已经融为一体。

本书的诸多内容大多先后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这次按照研究内容的逻辑性,围绕中国的现代性建构这条主线,分析了哲学的文化转向。全书分为八章,主要内容以西方文化哲学作为参照,考察了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百年历程,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实践诠释学,重点研究了综合创新派文化哲学和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不同方案,具体分析了现代性在科技发展和城市建设中表现出来的“悖论”,展现了中国现代性的未来前景。

一、文化哲学的实践诠释学。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基础,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实践诠释学,提出了一种文化价值的“有一无”统一观,并以此来评价和衡论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

二、文化哲学百年回眸。主要展现了百年来中西方文化哲学发展的历程及其内在逻辑,对20世纪中西文化哲学的发展及其规律做了简要的总结,这种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讲只不过是一幅大致清晰的“文化哲学”地图。

三、主要研究了对我自己的哲学研究有很大影响的冯契哲学,虽然我们读到冯契先生的著作时,可能明显地感受到他那个时代的局限,但是冯先生对“智慧的探索”的精神将是永远长存的。冯友兰先生和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阐释各有自己的特点,我从两位先生的著作中感受到了中国哲学的精深和“永久的魅力”。

四、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我对现代新儒家的了解得益于方克立先生等人对现代新儒家研究的一系列著作,我又通过这些研究著作使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啃”现代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的著作,感受到现代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钟情”和“厚爱”,从而也发现了自己从一个“科学人”到“人文人”的不足,同时也意识到我的一切研究(哪怕是最抽象的研究)都离不开对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的眷念、对现代化的忧思以及对众多现实问题的拷问和关切。

五、综合创新派文化哲学。就学界来说,这是以张岱年先生和方克立教授为旗手,有很多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积极提倡并大力倡导的

一种文化哲学主张。虽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袖人物并没有明确地提出“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但是我对他们的文化哲学(文化观)的阐释都是采用了“综合创新”的透镜折射的。

六、中国现代性研究。主要解读了两本有影响力的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一本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另一本是吉尔伯特·罗兹曼等集体合作完成的《中国的现代化》。毫无疑问,要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我们就不能不读这两部著作。这一点在我到哈佛大学访问之后,我的感受和体验更为深刻。当然,他们对中国现代性的阐释是否准确或正确还有待于读者运用自己的心智去判断。

七、科技文化与人文精神。可以说这是对中国现代性在科技领域表现的研究,或者说是对中国科技现代性的研究。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落后就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当我们在大力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科学技术也有其自身的限制和适用的“范域”呢?“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融合”一文比较详细地阐发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八、文明城市与城市文明。由于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甚至有人说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斯宾格勒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文明城市与城市文明的研究也是对中国现代性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参加了大连市委宣传部主持的199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的理论与实践》(99BSH023),本章的第一、二两篇论文就是参加这个课题所完成的成果。第三、四两篇论文是我参加大连市讨论学习型城市 and 人文大连发表的讲演,这里一并收入,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案吧!

通过以上的概述,我们不难发现本书的书名虽然是“哲学的文化转向”,然而它的主线则是围绕着中国的现代性研究,这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可以说,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以及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将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前我们永远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的主题,本书只不过是这一重大问题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记录而已。

目 录

丛书总序	洪晓楠	1
前言		1

一 文化哲学的实践诠释学

文化价值的有一无统一观 ——兼评中国现当代文化哲学思潮		3
综合创新与文化发展		7
后新儒家时代的来临		12

二 文化哲学百年回眸

文化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与世界		21
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的演进规律和理论倾向		33
中国当代文化哲学的时空背景和演进规律		40
港台文化哲学透视		48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影响		54
再论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观		59

三 冯契哲学研究

冯契的哲学观		73
冯契与中国哲学现代化		88